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07

幸福，细节及伪装：纳博科夫的蝶类学之旅

刘珊¹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纳博科夫的蝶类学研究与其文学创作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视角。蝴蝶的多样性源于微小细节的差异，这一观察启发了他对文学细节的重视，形成激情与精确相互融合的特点。此外，蝴蝶的伪装与拟态现象启发纳博科夫运用戏仿手法构建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文学世界，展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创作风格。蝴蝶象征着他对幸福的渴望，这种渴望延伸至笔下的人物和读者，形成独特的文学体验，深刻影响了其创作内容。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纳博科夫的创作特色与思想深度。

关键词：纳博科夫；蝶类学；幸福；细节；伪装

从蝶类学视角观照纳博科夫的研究状况，西方学界成果斐然，相形之下，中国学界的研究则略显局促²。通过探寻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研究与他个人写作的深层联系，能够揭示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超凡的美学思想及作品中的隐秘联系。这不仅为理解纳博科夫的创作提供了新视角，更从跨学科角度出发，将蝶类学与文学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家创作内容和形式的成因，帮助读者更立体地理解作者其人其作。纳博科夫自离开俄国后，一路颠沛流离，从西欧始至瑞士终，从少年意气到英雄迟暮，从普通的网蝶人到著名的著作家。他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蝶类学的热爱，他曾戏谑称，“假如俄国不发生革命，也许我会把全部生命献给蝶类学³，根本就不会写什么小说”^{[1]104}。对蝴蝶的终身迷恋铸就了纳博科夫在生物学领域的成就，也深刻影响着其美学观念，为纳博科夫小说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力量。纳博科夫从科学视角去切入文学内在，窥见文学的本质，由此形成了独具个人性的意象特征——蝴蝶。在一些诗歌和许多小说中，蝴蝶和飞蛾戏剧性地冲击着文本。即使在似乎没有任何和蝴蝶主题相关的作品中，其意象和捕蝶经历也会从作者头脑中浮现出来，最后创造性地转化为文本内容。

一、蝶类象征幸福渴望

纳博科夫一生中从事过多个职业，但谈及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时他往往将在哈佛大学博物馆的显微镜前研究蝴蝶的岁月与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捕捉蝴蝶相并列，蝴蝶就是这两段幸福生活的共同点，也就是幸福的象征，可以说有关蝴蝶的经历在纳博科夫心理世界内化为一种最快乐最刺激的情感体验，蝴蝶于是在其文学世界里往往与幸福勾连，并将其视为审美幸福的自然表达。纳博科夫常常将自己对蝴蝶的情感和

¹ 作者简介：刘珊，（2002-），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 金华 321004），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邮箱：liushan200205@163.com

² 如西方学者已编写了多本著作：约翰逊（Kui Johnson）和科茨（Steve Coates）的《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布莱克威尔（Stephen H. Blackwell）和约翰逊（Kurt Johnson）的《优雅的线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科学艺术》、布莱克威尔（Stephen H. Blackwell）的《笔尖与手术刀：纳博科夫的艺术和科学世界》等等。而中国的研究较少，且多从整体上把握蝶类学对纳博科夫的影响，如刘文飞的《纳博科夫与蝴蝶》没有更加细致地剖析两者关系，马凌的《谈纳博科夫的“蝴蝶美学”》和赵君《蝴蝶研究对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的发生学意义》等人的文章虽关注到了纳博科夫小说创作中的蝴蝶美学，但介绍太过笼统。

³ 蝶类学是昆虫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蝴蝶和蛾子（统称为鳞翅目）的科学。

记忆融入作品，将其转化为笔下蝴蝶爱好者深切的渴望，还将他丰富的昆虫学知识融入其中，使作品充满细致的蝴蝶描写。这些独特的元素为蝴蝶爱好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激发了他们的阅读渴望，使他们能够在阅读中享受关于蝴蝶的真实、科学的探索。纳博科夫的蝴蝶经验由此不仅塑造了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文学世界。蝴蝶所象征的幸福渴望，不仅凝结在纳博科夫本人及其笔下蝴蝶爱好者的形象之中，同时也延展至文本外部，成为众多痴迷于蝴蝶的读者所共鸣的情感向往。

纳博科夫在童年时期就喜欢蝴蝶，他从七岁开始捉蝴蝶，十岁左右广泛阅读俄英关于昆虫的杂志并且自信已经熟悉欧洲分布的蝴蝶种类，但十月革命的发生中断了纳博科夫美妙的蝴蝶梦，使其成为了一个流浪者。流亡西欧的纳博科夫受困于时间和金钱，为了生存辗转在网球教练、俄语家教和文学写作等各个职业之中，但显然他并没有放弃对蝴蝶的迷恋。他仍然渴望过去的快乐的捕蝶时光，怀念曾经单纯的捕蝶人，每每想起蝴蝶，纳博科夫总是想起了儿时家庭的温暖，想起了父亲在监狱时递来的纸条上写的有关硫磺蝶和菜粉蝶的文字，想起了在维拉庄园“捕捉”到的初恋情人，他渴望迷乱的蝴蝶能够穿越严酷的圣彼得堡，奇迹般地带来初恋的信。所有的这一切有关蝴蝶的记忆不仅仅是纳博科夫发现一种新的物种并为其命名的喜悦，还象征着纳博科夫家庭的亲情，寄托着少年的伟大抱负。对于流浪者的纳博科夫而言，蝴蝶宛如暗淡现实中的一缕理想之光，带着幻影般的幸福召唤着他。对他而言，亲赴遥远的国度，亲眼目睹它们在天空中翩然翻飞，亲手捕捉那些美丽的蝴蝶，是一种无法遏制的甚至病态狂热的渴望。这种渴望属于纳博科夫本人，也属于他笔下的蝴蝶梦想家。

在众多纳博科夫创作的以蝶类学爱好者为主人公的作品中，第一本小说是《蝶蛾采集家》，原题为《皮尔格拉姆》，是用俄语创作的，后翻译成英文刊登于《大西洋月刊》。皮尔格拉姆是一个年迈的居住在柏林的蝴蝶标本商店店主，他自幼钻研蝶类学并自学成才，店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然而他一生却从未踏出柏林，捕异域蝴蝶的梦想成为他心中的永恒诱惑。柏林的蝴蝶已激不起他的兴趣，他幻想着登上传说中的幸福岛，穿行于齐腰深的草丛中，挥动捕网，他似乎看见“一只白色的蛾子突然从无边的沉沉夜幕中飞进来，翩翩飞舞，扑棱有声，满天花板找着自己的影子去亲吻。这景象清清楚楚，如同亲身经历的往事一般”^{[2]333}。这种狂热的渴望驱使他用一笔不义之财资助自己的远游。然而，命运未允，他最终因过度兴奋摔死了。在这本小说中，纳博科夫不仅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困于柏林无法捕蝶的苦恼巧妙地融入到皮尔格拉姆对幸福的渴望之中，还在小说中娴熟地融入了蝶类学知识，虚构了一个采蝶人特有的昆虫世界。这些对昆虫学的细致涉猎不仅为故事注入了真实的力量，使作品的环境更显鲜活与具体，还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蝴蝶的丰富知识，满足了蝴蝶爱好者对科普与文学的双重渴望。如法国的迪涅、伏尔加河畔的萨雷普塔、阿尔卑斯的高山牧场等等，都是捕蝶人的胜地，是早期收集家常常出没的地方。再例如当昆虫界的熟人来拜访皮尔格拉姆时，他们突然谈起艾斯纳的母虫，“此刻要是有人进来买个抄写本或者买一张邮票的话，就会大惑不解，这两个人究竟在说什么呀”^{[2]332}。在这里纳博科夫并没有详细介绍艾斯纳，仅仅是提了点昆虫学知识，恰到好处地止步于点缀。纳博科夫在文学中巧妙运用蝶类时，常以暗示取代精确命名，优雅地描绘特征或习性，这种审美抉择展现了他对科学与艺术界限的尊重，保留了文学的独立性与美感。艾斯纳其实是科特·艾斯纳，欧洲一位著名的绢蝶命名家，绢蝶通体纯白或彩色斑驳，优雅迷人，广布于亚欧山地。纳博科夫笔下的昆虫学知识如一条潜流，悄然滋养着故事的肌理，使作品既超越了幻想又扎根于真实的土壤，同时对蝴蝶爱好者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天赋》也是一本有关蝶类爱好者的长篇小说，其中痴迷蝴蝶的父亲对费奥多尔关于蝴蝶引人入胜的讲解像是纳博科夫自身对异域寻蝶之旅的再创造。纳博科夫在这部作品中尽情展现了他对蝶类学的深厚造诣，从蝴蝶形态的精妙描绘，习性的细致列举到标本制作技艺的讲述，无不显露出他渊博的科学知识，使《天赋》不仅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文学作品，也为广大蝴蝶爱好者提供了生动的科普资源，拓展了他们对蝴蝶的理解，可以认为“《天赋》的部分成就是对鳞翅目昆虫学研究黄金时代的一次彻底、广阔及壮丽的再现，这才是纳博科夫更大的艺术目的”^[3]。并且在附录《我父亲的蝴蝶》中纳博科夫巧妙地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对蝴蝶本体论的认识，即熟悉一只蝴蝶就要用语言将其形象化，这种文化模仿行为“模糊了人类文化与蝴蝶本性之间的界限”^[4]，可见纳博科夫认为蝶类可以“入文”，没有文字，蝴蝶也就不完整了。再如纳博科夫还将自己写入斯坦利·库布里克邀约的剧本之中，人设也是一个痴迷蝴蝶的人。当时亨伯特和

洛丽塔在峡谷的泥路上迷路，汽车的散热器护栏挂满了被撞死的蝴蝶。他们偶遇一位捕捉蝴蝶的人，这正是纳博科夫本人。他沉浸在蝴蝶的世界里，回应亨伯特时，他表达了对标本的深刻见解：标本的价值不在于稀有或普通，而在于其完美或缺^[5]。这一细节不仅展现了纳博科夫对蝴蝶的迷恋，也象征了他对艺术与生命追求完美的哲思。皮尔格拉姆和切尔登采夫都是纳博科夫笔下的蝴蝶梦想家，连同纳博科夫自身，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幸福渴望，但是他们和纳博科夫又所不同。纳博科夫很好的将这种渴望与生活实际相平衡起来，他有着幸福的家庭：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而皮尔格拉姆则显得更加病态，他没有儿女甚至想起他们都心生厌恶，他看见妻子哭泣，竟残忍地想拿斧子砍了她白发苍苍的头。切尔登采夫家庭也是不幸福的，他为了研究蝴蝶，长时间冷落妻子和儿子，最终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失踪了。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捕蝶的幸福不仅仅是与蝴蝶本身有关，还连接着儿时美好的家庭亲情，而对于皮尔格拉姆和切尔登采夫蝴蝶仅仅是蝴蝶，具有强大的魔力。

二、“翅膀”塑造细节追求

纳博科夫通过对蝴蝶翅膀等细微特征的观察，将这种精细性融入小说中。世界上约有 18500 种蝴蝶，它们的种属区别源自翅膀的形状与大小、斑纹、触角的形状、翅膀的鳞片结构等细节。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铸就了蝴蝶的多样性，展现了它们在进化中的独特路径。蝶类身上的细节的魔力深深吸引着纳博科夫，在他看来，正如蝴蝶的美依赖于微小的鳞片，文学作品的成功也在于对细节的把握与雕琢。细节不仅赋予作品以生命力，还决定了其是否能在艺术中获得真正的价值。正如理查德·罗蒂所说：“蝴蝶翅膀上的粉鳞被刮干之后，剩下的是透明，而不是美，是没有感官内容的形式结构。”^{[6]214}因此，科学与文学的另一个契合点在于，二者都依赖于对细节的珍视，“在高雅艺术和纯粹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1]163}。纳博科夫对细节的极致捕捉，以及细节与场景、人物、主题、情节发生的联系，使一切显得格外鲜明生动，充满了令人炫目的精妙。这种细腻的视角显然源自他在显微镜下细致观察蝴蝶的习惯，敏锐与细心淬炼成他独特的艺术视角。纳博科夫带着自己特异的小说美学思想创作出一部部奇特的艺术品，融合着“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1]12}。

纳博科夫的作品中，以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和复杂的象征手法著称，作品的每一处细节都充满独特的隐喻和深意，展现了纳博科夫作为蝶类分类学家对细节的关注和判断力^[7]。无论是在人物的命名、地点的选择，还是对人物神态的描写都承载了纳博科夫的艺术意图，使文本充满解读的可能性。例如：在《黑暗中的笑声》中，背叛家庭的欧比纳斯每次大笑都暗含独特的象征，预示着他的情感与生活的多重层面，而雷克斯设计的小游戏折射出对“游戏人生”的讽刺与深思。在《洛丽塔》中洛丽塔的名字含义、话剧名称与旅馆名字的相似性、房间号的排序，都嵌入纳博科夫所擅长的语言谜题，有着深刻的寓意。例如布赖恩·博伊德就发现了“着魔的猎人”旅馆及帕沃尔府两个场景上存在大量相似这一细节对《洛丽塔》小说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认为此书是道德的^[8]。纳博科夫在小说结尾的两个场景中——“着魔的猎人”早晨的“勾引”和帕沃尔府的谋杀——构建了隐蔽的并列，以突显亨伯特始终不变的自私与控制欲，从未反省过自己。在两场事件之前，亨伯特都在帕金顿旅馆徘徊，两晚都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心中充满了对于下一步行动的蓄谋。两场行动之前，他都打去了电话，都准备了药物或子弹，试图操控他人：在洛丽塔那里是一盒紫色的胶囊，试图使她沉睡；在奎尔蒂那里则是那些无力阻止奎尔蒂的子弹，反倒让对方更为疯狂。在追逐洛丽塔和复仇奎尔蒂时，他始终无视他人鲜活的生命。他在“着魔的猎人”中将洛丽塔视为可操控的猎物，毫不在意她的意志；在帕沃尔府中对奎尔蒂更是如此，将对方的生命弃之如敝履。这两个情节中的相似使得亨伯特的所谓“顿悟”显得虚伪。读者常被引导至最后那一幕，在亨伯特俯瞰山谷、聆听孩子们的嬉笑声时，“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9]，以为他终得道德升华，认识到对洛丽塔的伤害。然而，纳博科夫似乎暗示，这一“顿悟”并非真正悔悟，而更像是他对自己形象的修饰。将这种悔悟呈现给读者，仿佛企图借此掩盖自己的一切罪行，以示自己的道德复苏，但这种修辞策略只是他进一步自我保护的手段。亨伯特在内心深处明白，他一直在摧毁洛丽塔的童年、精神，将她囚禁于自己的情欲与自私之中，但只要能得到一丝满足，他便继续将这种道德感抛诸

脑后。他在俯视山谷时的悲悔，实则是对自身情欲无法再得到发泄的遗憾。当洛丽塔已远离他，他才将悔恨延至事后，营造出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的形象，然而真正的悔过应该是在事前克制。尽管亨伯特尽力地为自己辩护，但纳博科夫巧妙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亨伯特是罪不可恕的，不能得到原谅。再如“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科学迷恋明确地构成了他激进的字面翻译方法”^[10]。例如他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为达到对原文的严格忠实，采取了英语中极其罕见的词如 familistic、shippon 等。“我的译文是逐字逐句进行的，是直译。为了忠实原文我牺牲了一切典雅、和谐、清幽佳味、现代用语、甚至语法。”^{[11]42}在纳博科夫看来翻译应该像解剖学家对标本的操作一样，要精确地传达表面的语言信息，翻译的过程就是通过语言的准确性和细节的呈现来“揭示”文本的内在构造，进而展现出作品的深度。正如他在《翻译问题：奥涅金的英译》中指出一样，“原始文本将无法翱翔和歌唱，但它可以被非常好地解剖和装裱，并对其所有有机细节进行科学研究”^[11]。亦或者是理查德·罗蒂通过对“卡思边的理发师”进行放大镜式的研究，发现了纳博科夫对待“残酷”的态度^{[6]224}，而“卡思边的理发师”在书中只提过一次。还有在科罗拉多州，洛丽塔和亨伯特经常在“雪”和“埃尔芬斯顿”之间徘徊^[12]。这些名字其实是蝴蝶的指代，它们是高山峭壁和岩石地带的常客。前者，如同一块炽热的金属锭，纳博科夫在科罗拉多州的特勒德收集。后者，则是一朵可爱的柠檬色硫磺，他希望在阿特拉斯山脉找到。可见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细节不仅包含深意还带着蝴蝶的色彩，给爱好鳞的读者留下了只有他们才懂的礼物。纳博科夫通过对细节的精致设计，不断为现实蒙上一层戏剧性的光辉，将现实转化为一场黑色幽默的戏剧，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在这个他创造的文学世界中，现实与艺术、语言与符号相互交织，勾画出一个令人震撼的、极富美学意味的独特世界。

纳博科夫不仅是一名富于创造性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教授，他解读文本的观念与“新批评”不仅高度契合，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仿佛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深入挖掘出经典文本中那些往往被读者忽视的细节。例如，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指出了“比喻中层层套着比喻”的独特特征；在《荒凉山庄》中，他将“浓雾”与主题关联起来；而在《尤利西斯》中，他精确分析了时间与人物动作的同步性。纳博科夫不仅仅是从细节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形而上的总结，还关注形而下的文本细胞。例如，他还在课堂上为学生绘制《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地形图、《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居住的公寓的平面图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中俄国火车包厢的细节图，这种深入的分析 and 视觉化的呈现效果，使得学生能够在具体的空间与细节中，真正感受到作品的复杂性。在他的课程中，细节并不是附属的装饰，而是理解作品的关键。他通过细致的讨论与引导，让学生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理解，而是深入到作品的内在逻辑和结构中，从而实现对作品“神秘”的探索与总结。例如在《包法利夫人》中，他向学生讲授“农业展览会”章节的“多声部配合法”时，他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对角色的第一眼印象：爱玛的阅读经历、她所使用的阳伞及其造型、她的眼睛与双手的细微特征、她的衣着和鞋子的风格等，这些细节都可能蕴藏着深刻的意义。

三、伪装启发戏仿叙事

纳博科夫深受蝴蝶伪装技巧的启发，他通过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和戏仿手法构建复杂的叙事结构，打造出一个充满欺骗的文学世界，这种设计与欺骗思想的融合也正是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之间最紧密的联系点^[13]。蝴蝶的一生中面临许许多多天敌，为了更好地生存，它们通常使用伪装、拟态⁴、保护色等多样化的手段以保护自己。例如柑橘凤蝶幼虫通过拟态环境装成鸟粪来迷惑捕食者。另一种经典的伪装案例是红斑蝶对帝王蝶的“贝氏拟态”，其原理在于，被模仿的物种对捕食者而言不可食，而模仿者则无毒并借此获益。帝王蝶幼虫因食用萝藦草而使成虫体内积累毒性糖苷，能引发捕食者呕吐，从而避险。而“无毒”的红斑蝶凭借与帝王蝶的相似外观得以避敌。《天赋》中关于蝴蝶伪装的奇异描绘也随处可见：“他跟我说起巴西丛林里狡黠的蝴蝶，模仿当地一种鸟儿的嗡嗡声。他跟我说起模拟性伪装的不可思议的艺术智慧，无法用求生的努力加以解释（进化的不熟练力量的冒进），过于精妙，不适于仅仅蒙骗偶然出

⁴ 拟态是动植物改变自身形态以适应于环境的一种做法。

现的猎食者。”^[14]在这纳博科夫借主人公的口提出了他对蝴蝶模仿的看法，如果蝴蝶的模仿仅仅只是为了躲避天敌的攻击，那么如何解释蓝蝶蝶翼上对露珠的模仿，露珠上甚至还闪烁着阳光。蓝蝶的奢华、细致、繁复的防卫技巧，超越了捕食者的辨识力，而且似乎几乎是由某个爱搞怪的艺术师为人类发现而特意设计的，达尔文的自下而上的自然选择原则似乎无法完全解释^[15]。因此纳博科夫认为蝴蝶的模仿远非单纯的生存手段，更是一种无功利的自然之美。“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 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16]自然与艺术间的奇妙共鸣，影响了纳博科夫的现实观，铸就了纳博科夫深具欺骗意味的文学世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的现实，即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和小说中的现实。小说中的现实是可以文字创造的、是魔术师的艺术、是蝴蝶般五光十色的现实。现实不是独一无二，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造。

在《看，那些小丑！》有这么一段话，生动地反映了纳博科夫对现实的态度：“草木是小丑，文字是小丑。场景、数字都是小丑。把两件东西放在一起——玩笑、形象——就有了一个三料小丑。来吧！玩吧！虚构世界！虚构现实！”^[17]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作品如蝴蝶般迷惑人心，而读者则像捕蝶人，透过层层伪装与巧妙诡计，细细解构文本，最终窥见其中隐藏的“骗局”，领悟其精心构建的艺术真相。

在这种思维之下，纳博科夫在创作中娴熟地使用戏仿手法，将他的小说构建为一个充满讽刺、模糊真实与虚假的后现代叙事迷宫。例如《天赋》是对传记的模仿；《艾达》模仿百科全书的体例；《洛丽塔》中又融入日记体、忏悔书等；《黑暗中的笑声》更是借电影艺术的风格进行讽刺。纳博科夫不仅在形式上游刃有余地使用戏仿，还在内容上将这种手法推向深刻，使每部作品看似是对严肃主题的探索，实则透着滑稽与揶揄。《洛丽塔》一书中，纳博科夫借主人公亨伯特讲述其恋童经历，他让亨伯特的种种描述看似正当，读者在阅读时却能感受到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冷嘲热讽。在《微暗的火》中，纳博科夫实现了他最为大胆的文本伪装：他将诗歌与注释这两种表面上看似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被巧妙地嵌套在一起，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讽刺基调和学术结构^[18]。小说表面上是学者金伯特为诗人谢德的长诗《微暗的火》所作的注释，然而，金伯特在注释中所详尽描述的，实际上是一段被废黜的赞布拉国王的离奇身世叙述。这种设定不仅令读者对人物关系和故事真相产生了迷惑，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文学解读的界限。谢德的诗歌分为四个章节，从他的少年时期开始，探讨他在成年后对人生意义的深刻体悟，他试图揭示人类生活中微妙的模式，反映出存在的本质。然而，金伯特对这段诗作的注释却显得既琐碎又牵强，极力在细节上展开，偏离了诗歌的主题，甚至达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这种脱离使得注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对原诗的一个解构，迫使读者在诗与注释之间徘徊，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在阅读优雅的诗歌与拗口的注释时，读者往往会感到迷惑与愤懑。注释表面上具有学术的严谨性，金伯特用大量的学术术语和复杂的推理试图阐释诗作的每一个细节，但读者在字里行间逐渐意识到，金伯特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的学术表达更多地是对知识的炫耀，而非对诗歌内涵的真正理解。进一步细读可以发现，纳博科夫在此刻意地呈现了一种对“学究气”的戏仿。他利用金伯特这一角色，反映了他对某些学者在解读文学时所表现出的过度分析和炫耀知识的讽刺态度。金伯特的注释虽试图赋予诗歌更深的意义，但使得诗歌的某些本质意义被削弱。这种反向的解读不仅让读者在理解上变得更加困惑，也使得诗歌的独特性在金伯特的解读中变得模糊不清。《微暗的火》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戏仿作品，更是纳博科夫对文学边界的大胆挑战，这种独特的文本形式将小说的传统叙事结构解构得支离破碎，超越了传统的文学评注，成为一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实验。

四、结语

在现代科学史与艺术史中，纳博科夫的案例或许独一无二，其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对美的情感，已融入科学与艺术的创作反应中，他的作品巧妙地打破了自然与文学的边界。^[19]在纳博科夫的创作中，蝴蝶作为一种深刻的象征，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幸福渴望，还映射出其笔下人物及读者的情感追求，对创作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蝴蝶对纳博科夫创作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蝴蝶的观察和研究极大地影响了纳博科夫的细节描写，文章中任何细微的细节都可能蕴含深刻的意蕴，他细致的文本解读方法也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内在逻辑。其次，蝴蝶的伪装特性启发了纳博科夫对现实的理解和戏仿手法的运用，从而重构了传统小说文本的表现形式。综上所述，蝴蝶不仅是纳博科夫作品

内容与形式双重影响的载体，更是其艺术追求与美学探索的重要象征。

参考文献

- [1] [美]纳博科夫. 固执己见[M]. 潘小松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104.
- [2] [美]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M]. 逢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3] [美]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夫·科茨. 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M]. 丁亮, 李颖超, 王志良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410.
- [4] Alec Brookes. “Butterflies in the Chthulucene: Reading Nabokov Geologically”. *Russian Literature*, 2020, Vol. 114-115: 85-104
- [5] [美]纳博科夫. 洛丽塔:电影剧本[M]. 叶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141.
- [6] [美]理查德·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徐文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 [7] Newman, Daniel Aureliano. “Nabokov’s Gradual and Dual Blues: Taxonomy, Unreliability, and Ethics in ‘Lolita.’ ”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vol. 48, no. 1, 2018, pp. 53-83.
- [8] [新]布赖恩·博伊德. 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1940-1959)[M]. 刘佳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364.
- [9] [美]纳博科夫. 洛丽塔[M]. 主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492.
- [10] Larson, K. Maya. “Nabokov’s ‘Diabolical Task’: Translation as Capture and Becoming-Butterfly”. *Deleuze & Guattari Studies*, 2020, Vol. 14(4): 585-603.
- [11] Nabokov, Vladimir.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n,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19.
- [12] PYLE, ROBERT MICHAEL. “Nabokov’s Butterfli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69, no. 1, 2000, pp. 95-110.
- [13] De la Durantaye, Leland. “Artistic Selection: Science and Art in Vladimir Nabokov.” *Transitional Nabokov*, edited by Will Norman and Duncan White, Peter Lang, 2009, pp55-66.
- [14] [美]纳博科夫. 天赋[M]. 朱建迅, 王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15.
- [15] Zimmer, Dieter E. “A Guide to Nabokov’s Butterflies and Moths, 2001”. *Stalking Nabokov*, New York Chichester, West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0-106.
- [16] [美]纳博科夫. 说吧, 记忆[M]. 陈东飙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112-113.
- [17] [美]纳博科夫. 看, 那些小丑![M]. 吴其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11.
- [18] MEYERS, JEFFREY. “The Bulldog and the Butterfly: The Friendship of Edmund Wilson and 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63, no. 3, 1994, pp. 379-99.
- [19] Fet, Victor. “Notes on Nabokov’s childhood entomology.” *Fine Lines: Nabokov’s Scientific Art*, edited by Stephen H. Blackwell and Kurt Johnson, Yale UP, 2016, pp. 216-224.

Happiness, Detail, and Disguise: Nabokov's Lepidopterological Journey

Liu Shan

Abstract: Nabokov's research on lepidopterology intertwines with his literary creation, forming a unique artistic perspective. The diversity of butterflies arises from subtle differences in detail, an observation that inspires his emphasis on literary nuances, resulting in a fusion of passion and precision. Additionally, the phenomena of butterfly camouflage and mimicry inspire Nabokov to employ parody to construct a literary world that is both real and illusory, showcasing a postmodernist style of creation. Butterflies symbolize his longing for happiness, a desire that extends to the characters and readers in his works, creating a distinctive literary experience that profoundly influences his content. This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id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Nabokov's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llectual depth.

Keywords: Nabokov; Lepidopterology; Happiness; Detail; Disguise

Author biography: Liu Shan (born in 2002), female, of Han ethnicity, from Hengyang, Hunan. She is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with a research focu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liushan200205@163.com